

● 现当代文学

《倪焕之》的版本变迁^{*}

金 宏 宇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金宏宇(1961-), 男, 湖北英山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摘 要] 《倪焕之》有四个重要的版本: 初刊本、初版本、删节本和文集本, 其版本的变迁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修改意向: 艺术完善、与新的文学规范接轨、语言规范化。这部小说具有不同的版(文)本“本”性。

[关键词] 《倪焕之》; 版本; 修改

[中图分类号] I 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734-06

从1928年1月20日起, 叶圣陶应《教育杂志》编者李石岑、周予同之约, 在该刊第20卷第一号“教育文艺”专栏开始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 至该刊第20卷第12号(1928年12月)载完, 共30章。经修改后于1929年8月由开明书店初版, 书前收夏丏尊《关于〈倪焕之〉》一文, 书后收《作者自记》并节录茅盾的《读〈倪焕之〉》一文。这个版本在解放前共印13版。经删改后, 195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只有22章的删节本, 3篇附录文章亦删去。到1956年, 这个版本共印3次。1956年的俄译本也是根据这个版本。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叶圣陶文集》第三卷时, 又收入30章本, 但作者进行了大量修改, 同样删去3篇附录文章。1962年11月据文集本又出了一个单行本, 1978年12月又据这个版本重印, 附作者新作《后记》。笔者通过仔细对校《倪焕之》的重要版本, 发现其版本变迁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意向: 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主要是小说艺术完善方面的考虑; 从初版本到删节本的变迁是为了与新的文学规范接轨; 从初版本到文集本的改动基本上是一个语言上加工变换(主要是规范化)的问题。

一

在《倪焕之》初版本的《作者自记》中叶圣陶曾说: “我不大欢喜校刊疏忽的书本, 这回校自己的书, 颇用了点心思。全书排成后又曾请调孚先生精细校阅。”在未决定出版之前, 叶圣陶还请夏丏尊校读过一次。所以初版本中误植非常少。但笔者以初版本与初刊本对校后发现作者所谓的“校刊”中实际上还包括不少“修改”, 除了许许多多的小段落调整合并成较大的段落之外, 文字上的改动有90多处。其中改动最多的章节是第二章(20处)和第三章(26处)。

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 主要是文本的艺术改进。既有词句上的润色, 如“以次”改为“依次”, “哀愁”改为“无端的哀愁”等。更有整体上谋篇布局、叙述格调、人物刻画等方面的精心修改。为了整体的效果, 作者在修改时甚至不惜牺牲局部的精彩。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修改最能体现这一点, 这两章改

动最多，删去的文字和直接对话改为间接叙述的文字主要集中在这两章（删4处，改11处）。这两章写倪焕之来到水乡小镇任教以前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家境，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所在，因此作者以回溯和补叙的方式来写。但其篇幅不宜太长，笔法却应概括、简洁，所以在初版时作者就朝这方面用心思，或删去冗赘，或改变表现方式。另外，将初刊本许多小段合并为大段，表面看只是文面上的调整，实则已顾及上下衔接，这也是艺术改进中的一个方面。总之，初版本是比初刊本艺术上更为精良的一个版本。

二

1953年的删节本是在初版本基础上进行删除和改动的。删去的8章是初版本第20章和第24章至第30章，即删去概述“五四”运动的一章并使故事终止于倪焕之参加“五卅”运动。初版本的第21章、第22章、第23章则顺移作删节本的第20章、第21章和第22章。另外，还有两处辅助性的修改。

关于为什么要出《倪焕之》删节本，叶圣陶语焉不详。他只说：“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20章和第24章到末了儿的七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一九五三年的版本只有22章。”^[1]（第1页）但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其中第20章的删除可能只因为考虑到它在整个文本艺术构成中的不和谐问题。这一章是从办刊物、集会结社、西洋学术及文学的引进、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等方面概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及当时许多典型词汇如“觉悟”、“新”、“解放”、“人”、“国粹”、“德漠克拉西”、“劳动”等。可说是一篇很好的历史论文。在初版本序文即《关于〈倪焕之〉》中夏丏尊曾批评这一章“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因此，作者在删节本中删此章。而最后7章的删除和第23章的改动，虽然作者同样没有明示原因，但我们却可以从多方面推断作者砍削这些内容是为了与新中国的文学规范接轨。

我们先看这些修改内容本身。删节本所删的最后7章（第24至30章）写了北伐的胜利给倪焕之先前所在的那个乡镇带来的变化，蒋老虎盗取了革命果实；写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的革命气象及所遭遇屠杀的惨景，革命者王乐山被捅死；写了倪焕之在革命前的兴奋、革命中的狂热和革命低潮时的忧郁、激愤，最后生病逝去。这7章描写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重要的大革命年代，但为了让作品在当时能得以发表和出版，许多真实情况都未明白交代。如王乐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左派？倪焕之加入的是不是国民党？谁是上海大屠杀的凶手？大屠杀的阴谋和事实又如何引发人民的愤慨和斗争？等等。作者都处理得极其隐约、暗晦。另外，整个故事以悲剧作结局，虽然已寄希望于未来，不免笼罩着浓厚的幻灭气氛。这些处理方式显然不合新中国文学的写作规范。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确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国家的文艺总方针。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新中国文学的根本准则和头等任务。一系列新的文学规范被确认，如，写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表现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乐观取向和赞歌格调等等。《倪焕之》既然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修改，自然不得受这些新的文学规范制约。它的删节也可能有避免初版本艺术缺憾方面的考虑，但删节后的文本客观上是一个更接近新的文学规范的文本。删去这7章既避免了交代人物党派归属等政治麻烦，又去掉了悲观、幻灭的结局。删节后，故事终止于“五卅”，文本呈乐观取向。故事的结尾一段是：

他开始跑步，向那边奔去；一个久客的游子望见了自家的屋标，常常会这样地奔跑。自己像鱼呀，像鸟呀，这一类的想头主宰着他，他所感受的超乎欣快以上了。

这完全是左翼革命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的光明式结尾。更重要的是倪焕之从此奔向工农的怀抱，将与工农相结合。此外，删节本第22章（第170页）删去初版本第23章一节文字，删去了造成农民贫困的另外两个原因：赌博和酒。使读者不产生农民与赌徒或酒徒之间的联想，农民的形象也仿佛高大一些。删节本上引同页修改的一处又更突出了田主和胥吏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这是两处辅助性的修改。总之，在删节本中主要人物虽然不是工农兵而是知识分子，却是知识分子投奔工农阶级。工农“是异常地伟大”（删节本第172页），是知识分子新生的力量和源泉。因此，这种删除和改

动使删节本更接近新的文学规范,当然不是说它完全吻合新的文学规范。

在删节本《倪焕之》扉页的“内容说明”中有这样一句导读性文字:“主人公怀抱着高远的空想,企图改造学校、改造家庭、改造社会,但是一切都失败了,最后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才找到了真正的道路。”删节本出版后批评家也给予了肯定和新的阐释。如,“我以为作者删去这一部分在当时不能不含混其词的文章是对的。现在的结尾无损于小说的完整,它说明这位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或者说他已找到一个新的学校。那么,如果他要改造社会,当然不会依靠他的老学校,而就一定要依靠这个新学校了。”也有文学史家将删节本写进文学史。说“‘五卅’运动又将我们的主人公向前引了一大步,他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坚决革命意志和伟大的力量。”“作者就这样完成了倪焕之性格的发展和思想认识的改变。”“作者描绘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道路,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唯一光明的出路——和工农结合,到群众革命斗争中去。”^[3](第212页)又如说“解放以前未经修订的原著在缺点方面比现在的修订本还更多一些”^[3](第120页)。这些阐释和结论也证明删节本《倪焕之》是一个更接近新的文学规范的文本。可见叶圣陶删节《倪焕之》与当时老舍删节《骆驼祥子》、曹禺修改《雷雨》是有同样的性质、意图和效果。

删节本《倪焕之》是一个新文本,它诞生于新的历史语境之中,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新的文学规范和价值取向为这个文本赋值和赋义。删节本自身在诱导人们朝一个新的方向解读。删节本具有和初版本不同的版(文)本本性。在此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一比较。在初版本的30章中,前19章主要涉及教育和家庭内容,后11章主要写社会革命。表现了倪焕之一生在爱情婚姻、教育事业和革命活动三个层面的追求和结果。在全书中,这种内容就构成一种内在结构,构成此起彼伏的三大段落。而作者特意安排的三次行船和四次饮酒又更确切地传达了倪焕之的这种人生节奏和整个故事的叙述节奏。三次行船安排在第一、二章(1916年初)、第17章(1918年春)、第21章(1919年冬)。四次饮酒安排在第三章(1912年初)、第四章(1916年初)、第24章(1927年大革命前)、第29章(1927年大屠杀后)^[4](第486-488页)。三次行船展示了倪焕之对理想教育、理想家庭、理想社会的憧憬。四次饮酒则展示了倪焕之愁郁——兴奋——兴奋——愁郁的心态。倪焕之一次次憧憬着理想并在追求过程中为之兴奋,而结果都是愁郁甚至幻灭。积极地说他是由希望而失望,复又从失望中产生新的希望,循环至死。初版本就这样表达着理想与现实无尽冲突的普遍性主题。用倪焕之的话是“理想当中十分美满的,实现的时候会打折扣!”或者说追求的东西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同时,初版本在结尾表明倪焕之之类的人是“不中用”的。第30章写倪焕之在昏沉中想:“……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一个个希望抓到手,一个个失掉了;再活三十年,还不是一个样!像我一样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个中用!成功,不是我们配受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受领去吧!作者让倪焕之在临死前审判他自己及和他一类的人,让他最后坐一次特殊的船(灵柩)航向死亡之海,而把成功和希望转让给了另一类人。有30章的初版本虽有布局上头重脚轻、行文上前缓后急的缺憾,但自成一有机整体。而只有22章的删节本解构了30章本的整体结构,而自成一语义系统。它省去差不多整整一轮追求和幻灭的过程,让故事终止于倪焕之走向工农,呈另一种主题指向。使文本成为知识分子“皮毛理论”的一种确证,并吻合了毛泽东的权威诠释:“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和工农众相结合。”^[5](第523页)因此,可以重新阐释文本。前19章表现的是倪焕之在教育、家庭方面一种改良主义的空想式追求,后3章则写他走向坚实的革命活动。倪焕之也成为从空想走向现实的典范,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在初版本中倪焕之逃不出“循环”和“命运”(见初版本第417页),删节本中倪焕之逃脱了循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初版本中倪焕之只有死路一条,删节本中起死回生,让倪焕之找到了参加工农革命的活路;初版本中倪焕之属于“不中用”的阶级,删节本中倪焕之融入或依附了工农阶级。在22章本中进行循环阐释,许多细节都会有新的释义。

三

从初版本到文集本,叶圣陶又说:“现在编文集,又有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八章补上了。”^[1](第1页)于是文集又恢复了30章本,但这个30章本已不是初版本那个30章本。在这之前,叶圣陶编订文集第一卷时曾在其“前记”中谈到他修改旧作的一个原则:“改动不在内容方面”。因此,文集本《倪焕之》除了那两处参考过删节本而修改的文字会引起不同释义之外,在思想内容上再无其他大的修改。而故事情节、整体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与初版本一致,未作改动。但在词语和句子上大量改动。笔者对校这两个版本,发现修改了4200多处。修改主要是词语的调换、颠倒、增删等。词语的调换有同音词或同音语素的调换,如“逐部”换成“逐步”、“擅场”换成“擅长”等。有方言词语换成普通话词语的,如“一歇”换成“一会”、“池荡”换成“池塘”等。有文言词语或古白话词语换成现代口语词语的,如“颇”换成“很”、“著花”换成“开花”等。词语的颠倒主要是语素次序的颠倒,如“欢喜”改为“喜欢”、“妙美”改为“美妙”等。增,主要是通过双音化、多音化和儿化来修改词语,如“曾”改为“曾经”、“有点”改为“有点儿”等。删,包括去掉助词“的”“地”和数词“一”及量词“个”等等。句式或句子也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文集本大体保存了初版本面目,语言细部上却面目不同了。这是一个语言上加工变换了的版(文)本。

叶圣陶这一次之所以要对初版本进行语言上的加工变换,有多种原因。叶圣陶一向不满意旧作,常用炒冷饭的比喻说明旧作的不必重印。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他的文集列入出版计划并屡次劝说他,他才同意出文集。既是出文集,自然带有作品定型的意思;既出定本,自然有必要趁机精心润色,少留遗憾。因此在前3卷《叶圣陶文集》中所收短篇和长篇小说,作者都在语言上仔细改过,《倪焕之》改动最多。作者修改《倪焕之》语言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想借旧作的修改为现代汉语规范化作一榜样。作者曾说:“至于旧作所用的语言,一点是文言成分太多,又一点是有许多话说得别扭,不上口,不顺耳。在应该积极推广普通话的今天,如果照原样重印,我觉得很不对。”这是《叶圣陶文集》第一卷“前记”里的话,用来说明《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中的《倪焕之》的修改原因同样适合。1955年10月,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并指出:“语言的规范化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叶圣陶身为著名作家、语文界领袖和出版界官员,自然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现代汉语规范化竭尽全力。实际上,他本人早已就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推动者之一。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用规范的语言修改过国家的许多文件和社论。1955年7月至10月,他又发表3篇文章谈汉语规范化问题。因此这之后不久所进行的文集本的修改是他的汉语规范化实践的一种具体表现。

文集本《倪焕之》语言上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的锤炼加工。即通过调换音节、增删词汇、修整句子等使语言变得更洗练更精当更和谐更流畅,也使那些缺乏表现力的词句变得更具体更生动。这是文集本在语言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语言更合现代汉语规范而进行的调整和变换。这除了使那些不合语法不合逻辑的词句变得更通顺更合理之外,主要是对文言词句、古白话或近代白话词句和方言词句的修改问题。二三十年代,文言初废,白话刚兴。在这样一个汉语发展过渡期,作家写作难免出现语言杂糅现象。所以《倪焕之》的写作难免将文言、古白话或近代白话和欧化语夹杂使用。写《倪焕之》之前,作者主要生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所以写作时又难免掺进吴方言。当然,叶圣陶当年写《倪焕之》时,以他的当教师和当编辑的职业习惯和他的认真性格,也在力求使该作符合当时的白话语言规范的。但20世纪50年代汉语规范化的要求更高,或者说真正的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是5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的。以这个时候的标准看《倪焕之》,自然有许多不合规范的词

句。而那些文言成分、方言成分和早期不完善的白话成分,更显得不顺耳不上口。因此文集本《倪焕之》自然把这些方面作为修改重点。据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父亲说“他在学校里读的是文言,写的也是文言。‘五四’前后提倡写白话文,写出来的其实是四不象:文言的成份还相当多;又掺杂些外国腔;是从当时那些生硬的翻译文字学来的;再加上些旧小说中的古代口语和别地方人不能懂的苏州方言。这样的文字不整理一遍,叫人怎么看得下去呢?”^[6](第329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叶圣陶把《倪焕之》细细整理(修改)了一遍。总的看来,修辞方面的考虑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为了使小说语言更合50年代的汉语规范。通过对语言的锤炼加工和变换调整,文集本《倪焕之》向语言美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方向更进一层了,虽然免不了有漏改或错改的现象。

对文集本《倪焕之》,简单地看,只是语言上有所修改而已,内容没有什么改变,因而还是叶圣陶自己所认为的保存了原来面目的旧作。但严格地说,它已是一个不同于初版本的新的文本了。这不只是一个人脱了旧衣换上新衣的问题,而是一个20年代穿长袍马褂的人变成了50年代穿中山装的人的问题。更哲学的说法是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问题。所以,从大的方面可以说,初版本《倪焕之》与文集本《倪焕之》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版(文)本,它们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语言规范,体现了不同的语言格调。可举一例:第十章,倪焕之看到小镇灯会的热闹,想到民众娱乐的重要,认为它是精神上的一服补剂。接下的文字初版本第129页是:

因为有这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滋味,还有兴致。否则单作肚皮的奴隶,即使不至悲观厌世,也必感人生的空虚。有些人说,乡村间的迎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应该取缔。这是单看了一隅的说法;依这说法,似乎农民只应该劳苦劳苦,一刻不息,直到埋入坟墓为止的!要晓得一场的迎神演戏,可以换回农民不知多少的新鲜的精力,因而再高兴地举起他们的锄头。

文集本第208页改为:

因为有这服补剂,才觉得继续努力下去还有意思,还有兴致。否则只作肚子的奴隶,即使不至于悲观厌世,也必感到人生的空虚。有些人说,乡村间的迎神演戏是迷信又糜费的事情,应该取缔。这是单看了一面的说法;照这个说法,似乎农民只该劳苦又劳苦,一刻不息,直到埋入坟墓为止。要知道迎一回神,演一场戏,可以换回农民不知多少新鲜的精力,因而使他们再高兴地举起锄头。

这是比较典型的修改。这两节文字意义几乎没有出入,但给我们的语感、文风却是不一样的。更有一些修改表面看也只是词句的改动,实际意义却稍稍变了。由此还可推知,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前后已不同了。这一点叶圣陶自己也承认:“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7](第1页)初版本是他而立之年热血之作,文集本则是他花甲之年冷峻的修改。不同的认知、感情、趣味自然都会隐现在语言文字之中,使文集本与初版本有一种微妙的区别。至于第23章删去使农民致贫的“赌博”和“酒”的文字以及突出他们受剥削程度的文字,说明文集本《倪焕之》多少也沾了一点解放后突出阶级性的写作风气。所以文集本更不纯是一本“旧作”了。总之,文集本《倪焕之》是旧貌换新颜,与初版本《倪焕之》相比,“本”性不同。

四

在现代作家中,叶圣陶是比较注重版本问题的。他在与朱自清合著的《略读指导举隅》的“前言”中,谈到阅读指导的第一项就是“版本指导”。说“读者读一本书,总希望得到最合于原稿的,或最为作者自己惬意的本子;因为惟有读这样的本子才可以完全窥见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含糊。”告诫当时的国文教师指导学生时,“哪种本子校勘最精审,哪种本子是作者的最后修订稿,都得给他们说明,使他们遇到那些本子的时候,可以取来覆按对比”^[8](第23页)。现在,当我们把他的名作《倪焕之》取来对比之

后,发现其初版本、删节本、文集本都是校勘精审的本子,都很少有误植情况。而文集本可能是作者最满意的本子,因为后来的重印都用这个版本。它的每一个版本都可以窥见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它的每一次修改都可以窥见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相比较而言,初版本比初刊本艺术上更精良,文集本比初版本语言上更流畅,删节本则表现了作者审美意识的一次转换;初刊本、初版本是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本,文集本体现了50年代的汉语规范,删节本却用20年代的汉语词句表述了50年代的文学精神。《倪焕之》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几种修改意向。其得其失,只有通过版本对校才能评说。

《倪焕之》的版本变迁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文学史评述和文学批评面临的版本问题。对《倪焕之》这样具有众多版本的作品来说,文学史的评述,既要注意作品诞生的历史时刻,也要顾及后来的版本,要备众本写众本,写其版本变迁史。同时,文学批评则应有版本精确所指原则,不可版(文)本笼统所指,也不可版(文)本互串,这关乎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叶圣陶. 叶圣陶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2] 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1册[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9.
- [3] 孙中田, 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卷[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 [4] 商金林. 叶圣陶传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6] 叶圣陶. 叶圣陶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7] 叶至善. 叶圣陶[M]. 香港: 三联书店, 1983.
- [8] 叶圣陶. 叶圣陶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9] 叶圣陶.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 [10] 方 白. 从空想走向现实[N]. 大公报, 1954-06-09.
- [11] 特约评论员.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N]. 人民日报, 1955-10-26.

(责任编辑 何良昊)

Edition Changs of *NI Huan-Zhi*

JIN Ho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JIN Hong-yu (1961-),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NI Huan-zhi* have four important editions: first-appearing edition, first edition, abridged edition, and selection edition. The change in the editions reflects three different intentions of revision: to pursue artistic perfection,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literary norm, and to be linguistically standerlized.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texts or editions of the novel.

Key words: *NI Huan-zhi*; edition; revision